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徐 蓝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密切相关；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又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相关联。因此要搞清和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就不能不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说起。该体系建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其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最终导致崩溃。它的彻底崩溃之时，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日。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其建立的时代背景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 巴黎和会及其后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与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包括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和洛桑条约）；2. 国际联盟的建立（国联盟约是上述每一个条约中的第一部分内容）；3. 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公约）。因此，如果我们说到凡尔赛体系，就是指上述的第一和第二方面的内容，由于洛桑条约是1923年7月战胜国与土耳其凯末尔政府签订的，并以此代替了色佛尔条约，所以我们可以说，凡尔赛体系是一战后列强经过近五年的时间，终于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建立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如果我们说到华盛顿体系，就指第三方面的内容，华盛顿体系是列强在战后建立的亚太地区的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于是，如果我们给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一个定义，可以这样表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列强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通过一系列条约和第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的建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新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人类进入20世纪并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当我们站在

战争的废墟上环视全球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政治地图的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请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欧洲仍然处于中心的地位，它左右国际事务，分为两大军事集团，并为重分世界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刚刚向海外发展，提出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但还缺乏实力，也没有机会向全球施展它的影响。

俄国内部正孕育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但革命尚未成功，不足以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

日本开始崛起，但是欧洲仍然把日本看成是东方的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

亚洲正在觉醒，但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尚不能对西方殖民利益给以致命的打击。

然而一战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世界地图：

欧洲相对衰落。一方面是欧洲分裂为战胜国和战败国，主要是受到战争创伤的英国和法国，以及战败了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原有的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纷纷解体；与此同时，在中欧和东南欧已经出现了许多民族独立国家。另一方面，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受到来自非欧国家和地区的真正挑战。在欧洲的两侧出现了崛起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在远东出现了恶性发展的日本和觉醒了的的中国。

美国在一战后开始真正走出美洲，参与国际事务，并力图左右国际事务，成为对欧洲主宰世界的挑战力量。

苏俄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革命，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害怕的并视之为敌对的挑战力量。

日本利用大战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畸形发展，独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并想独占整个中国，在亚太地区对欧美的力量进行着挑战。

中华民族的觉醒，对西方的在华殖民利益以及整个殖民统治构成威胁。

可以想象,处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版图之中,战胜国要对战后的世界作出安排,就不仅要考虑其自身的利益,考虑实力的对比,更要考虑变化了的世界形势。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在谋划战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前提和四点共识。

根据19世纪的经验,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缔结和约的办法安排战后的世界,便成为当务之急。同时这种安排又是根据强权政治的原则来进行的。这就必然蕴藏着今后冲突的根源。这是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前提之一。然而,这场大战对战前世界格局所造成的一系列变化与冲击,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主要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并迫使他们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形成了一些共识。这是战后世界秩序得以重建的前提之二。

那么什么是他们之间的共识呢?可以主要归纳为四点:

第一,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都指责战败国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并因此而要求战败国对协约国在战争中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从而使战胜国可以堂而皇之地掠夺战败国并获得最大的利益。这其实正是它们进行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本目的。

第二,战胜国都认为社会主义的苏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威胁,于是苏俄问题便成为战胜国在处理战后国际问题时的一个无法摆脱的重要因素,并因此使他们在严惩战败国的同时手下留情,从而使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成为日后反苏反共的屏障。

第三,随着战争的进展,在欧亚大陆上不仅出现了苏俄,还在中欧和东南欧出现了一批民族独立国家,这种形势使主要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考虑民族自决权问题。因此无论是出于抵消苏俄的“和平法令”中关于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还是出于对战败国的惩罚和实现在战争期间对盟国所作的秘密许诺,主要战胜国都不得不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符合他们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在处理战败国的领土问题方面有限地承认民族自决权,重建和建立一批民族国家。

第四,主要战胜国都要求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常设国际组织,通过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维护主要根据战胜国的意志而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国际法准则就是国联盟约,这个组织就是国际联盟。

这些共识就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缔结和约的基础。

然而,由于各国在大战中所处的战略地位不同,所获得的利益和遭受的损失也彼此相异,因此在列强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形势下,美、英、法、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又各自有着不同的掠夺要求和争夺计划。

美国打算争夺世界的领导权。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一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具体表现为:美国从战前欠外债30亿美元到战后协约国欠美国债务100亿美元,它掌握世界黄金储备的40%以上;华尔街已成为世界另一个金融中心。经济实力的增长使美国的政治野心随之膨胀,美国要领导世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表示:“我们应当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而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世界。”^①

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总纲领是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的“十四点原则”,它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战后的世界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包括:公开的和平条约必须公开缔结;保持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各国军备必须裁减;调整殖民地,对当地进行开发应该根据“门户开放”原则(第1—5点)。第二,抵制并消除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第6点)。第三,要求在欧洲和近东各民族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恢复和建立民族国家,或建立受到列强保护,实行门户开放原则的保护国(第7—13点)。第四,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包括大小国家的、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第14点)。^②可以看出,这个文件涉及有关列强瓜分世界的原则、战争与和平、建立国际组织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问题,的确是美国企图冲出美洲、对长期以来欧洲主宰世界的国际格局发出的公开挑战和冲击。威尔逊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第1、2、3点和第14点。也就是说,美国可以运用它的经济力量,通过国联使美国对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干预、仲裁,以控制国际局势。因此在这4点当中,威尔逊又认为国际联盟最为重要。^③

为了实现这个纲领,美国希望在欧洲保持德国的比较强大的政治军事地位,使之抗衡英法和反对苏俄;经济上也不愿过多削弱德国,以避免引起连锁反应,因为如果德国被严重削弱就无能力偿付赔款,英法就能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偿还拖欠美国的战债,美国的经济就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在亚太地区美国要削弱战后的所有对手英、法、日等国,保持中国的贫弱状态并实施门户开放政策。

但是美国的勃勃野心必然要遭到竭力保持并扩大既得利益的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顽强抵抗,而当时的美国在争霸斗争中又有着几个不可忽视的不利因素:其一,在最具关键作用的军事力量方面还不能与英法相抗衡,因此实力不够;其二,威尔逊在国会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底气不足;其三,外交斗争经验太少,威尔逊用所谓的“理想主义”面对“威尔士巫婆”劳合-乔治和“老虎”克雷孟梭的狡猾和

斤斤计较，必将受到很大挫折。为了保住国联，威尔逊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作了让步，这不但使美国在“十四点”中的许多主张没有得到实现，还由于国联盟约而使美国承担了许多义务。这就是美国国会不批准凡尔赛和约也不参加国联的最重要原因（当然还有美国的国内政治斗争的因素）。

英国企图维护原有的世界霸权并主宰欧洲。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在战争中受到了削弱，但仍有相当实力。战争使整个大英帝国损失严重，它成了欠美国 8.42 亿英镑的债务国，其国际金融地位开始动摇；在海外受到大大膨胀起来的美国和日本的排挤；自治领地和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也迅速增长。这一切都减弱了英国在战前所拥有的力量与影响。但是如果认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已完全衰落，却是言过其实。英国仍然保持着国际市场上较牢固的传统财政金融关系，支配着扩大的帝国的巨大资源，是欧洲盟国的债权国（它的欧洲盟国对它欠下了 17.4 亿英镑的债务），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不仅在欧洲最有经济实力，对美国也拥有军事优势。英国认为自己有左右欧洲事务、维持世界霸权的资格。

因此英国的计划是：要求德国及其他战败国支付赔款以恢复经济；消灭德国海军以保持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在欧洲继续实行传统的“大陆均衡”政策，反对过分削弱或肢解德国，以抗衡法国和抵制苏俄；在远东既要利用和日本的结盟反对美国扩张，又要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以保卫英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在巴黎和会上，英国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会议，并使它的要求得到了较多的满足。

法国企图争夺欧洲领导权。其根本原因是法国在战后的欧洲大陆上占有军事战略的优势。作为大战的主战场，法国的经济在战争中受到了大破坏，不仅约 7% 的国土和大部分工业及富庶地区变成了废墟，而且负债累累，欠美国 160 亿法郎，欠英国 130 亿法郎。但是德国的战败使法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他们守望着莱茵河，并控制着中欧和易于向东欧、巴尔干与近东扩张的重要基地。因此法国认为它有争霸欧洲大陆的实力。

但是法国最担心的是德国的东山再起。德国不仅是法国争霸欧洲的对手，也是法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法、德曾两次交战，一败一胜，胜得十分艰难。法国认为，要想称霸欧洲，必须一劳永逸地消灭德国这个宿敌和对手。因此法国的打算是：以永久保证法国的安全为理由，不仅要收复失地阿尔萨斯—洛林，还要彻底肢解德国，如建立莱茵兰共和国和巴伐利亚国家，把德国东部分出一些领土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要索取高达

2090 亿金法郎的赔款，从经济上摧毁德国；还要彻底裁减德国的军备，使德国失去东山再起的资本。显然，法国要彻底严厉制裁德国的打算必然会受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而经济上的困境又使它在外交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法国的计划不可能全部实现。

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边作战较晚，又没有打过什么胜仗，经济和军事力量相当薄弱，但野心却很大，要在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占据支配地位，这与英法的利益显然相悖，其要求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

日本是大战的另一个获利者。它利用英、俄之间的密约，乘欧洲列强厮杀之机获得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权。它的战后目标是独占中国，称霸亚太地区。显然，日本的野心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尖锐冲突，也威胁到在该地区拥有较大利益的英国，更为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所不容。因此日本最终必然会受到美、英、中的联合遏制。

上述的时代特征、战胜国的共识与各国的打算，在凡尔赛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都得到了反映，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留下了以后冲突的根源。

二、凡尔赛体系的问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凡尔赛体系中战胜国的要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凡尔赛条约第 231 条规定德国和其盟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实际上就使战胜国对战败国索取巨额赔款合法化，于是条约规定德国和其他战败国要向战胜国赔款。其二，对德国的领土安排和军事力量的严格控制，以及对德国殖民地的瓜分，对德国在中国山东利权全部移交日本等等，满足了法国、英国和日本的一些要求。其三，对波兰的复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南斯拉夫国家独立的承认，部分尊重了民族自决权。

但是凡尔赛体系留下的矛盾和问题也极为严重。这些问题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首先是战争的罪责问题。大量的资料已经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共同发动的，战争的罪责应当由双方承担。但是战胜国根据强权政治的原则，在凡尔赛条约中规定德国负有发动战争的罪责，给战胜国掠夺战败国提供了依据。但是它至少造成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

其一，根据这一条款，使构成凡尔赛体系的几个主要条约对战败国极为苛刻，其掠夺性骇人听闻，因此，必然导致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矛盾的加剧。德国虽然被迫在条约上签字划押，但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并对凡尔赛条约充满仇恨。例如，当 1919 年 5 月

12日德国国民议会讨论是否接受和约时，参加会议的所有党派从未有过的空前一致反对批准和约，会议主席伦巴赫曾用这样的话来结束会议：今天的会议进程是目前这一痛苦时期的巨大安慰。这是德国人民的全体代表反对他们命令我们接受的残酷和约的强有力的表现。谁也不能说我们中间有细微的分歧，有不同的心情；不，所有发言人的心情都是同样炽热的！我们不能接受这项和约。在和约的签字之日，德国各右翼报纸在第一版都加上了表示哀悼的黑框。^④可以肯定，随着国力的恢复与增长，德国必然会从要求修改条约到不履行条约，直至撕毁条约。实际上在巴黎和会期间，和约的缔造者之一、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预感到了这种危险。他在1919年3月25日的《枫丹白露备忘录》中写道：“历史证明，一项作为外交技巧和政治家手腕的成就而受到胜利者欢呼的和约，即使从长远后果看来是适度而有节制的，也必将被证明是目光短浅的，并且对胜利者来说，也是充满危险的。”他还说：“你们可以夺走德国的殖民地，将它的军队裁减到只够建立一支警察部队的数量，将它的海军降到五等国家的水平。这一切终归毫无意义，如果德国认为1919年的和约不公平，那么它将会找到对战胜国进行报复的手段。”^⑤积极主张掠夺德国的法国元帅福熙也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实际上，和会刚刚结束，德国的复仇主义者就喊出了“打倒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战后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在德国的蔓延，是30年代纳粹党得以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魏玛共和国本来是德国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它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被迫接受凡尔赛条约，因此无论是德国的右派还是左派都对共和国十分反感。右派认为它是在对帝国的革命中诞生的，特别是与屈辱的凡尔赛和约联系在一起；左派则认为它是镇压了11月革命的结果；而魏玛共和国本身也的确是继承了战败的苦果；而战胜国只要求这个共和国承担战争罪责，对加速德国的民主化进程置若罔闻，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共和国更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怀念帝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重振国威”，这种社会状态便成为纳粹党和希特勒上台的社会土壤。

第二是赔款问题。这个问题是凡尔赛体系中悬而未决的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巴黎和会之所以对赔款没有决定总数，是由于主要战胜国的态度极不一致。美国并不希望德国支付大量赔款（在“十四点”中美国只主张德国对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受到的战争破坏进行赔偿）；英国希望赔款有一定限度（尽管劳合—乔治曾向国民保证过要让德国拿出最后一个铜板），

法国则坚持要德国支付大量赔款。由于意见分歧太大，所以无法确定总数，只有留待以后由外国人组成的赔款委员会去作出随心所欲的规定。后来赔款委员会在法国的支持下规定德国应支付1320亿金马克，分42年还清，这就根本超过了德国的支付能力。即使是头两年零4个月应当支付的200亿金马克的规定，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正是因为坚决反对和约对德国和欧洲的经济政策而辞职的。他在辞职后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其中他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指出这种要求德国支付赔款的方法是“年复一年地永远地把它（指德国）的皮剥光。无论这种手术作得如何熟练和小心，在手术中多么注意不要杀死病人，它却代表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如果真被采纳并蓄意实行，人们的判断就会宣告，它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的最凶残的行为之一。”^⑥

德国虽然被迫接受赔款，但抱着“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策略，并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消极对待赔款，于是不仅法国与德国的矛盾不断激化，法国与英美之间的不和也日益严重。因此战争虽然结束，但20年代初期的欧洲并没有真正的和平。1923年由于赔款问题而导致的法国和比利时对鲁尔的占领，引发了战后一场尖锐的政治军事危机，并使欧洲几乎到达了战争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意识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凡尔赛条约中关于削弱德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要想解决赔款问题，必须先使德国的经济生活正常化，这就需要资金的注入，但是没有美国的参加，资金问题无法解决。

就美国来说，它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参加国联，对欧洲不承担任何政治义务。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经济手段参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打算，鲁尔危机给美国提供了机会。然而美国并不是通过重新规定德国的赔款总数直接解决赔款问题，而是派与官方关系密切的非官方人士、银行家道威斯来解决德国的财政金融问题，通过稳定货币、平衡预算、对德国提供贷款等方式使德国的经济生活正常化，使德国在支付赔款方面有了固定的来源（用税收、铁路和工业债券的收益来支付赔款）；并且只规定了5年的赔款数额。这就是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是对凡尔赛体系的调整。这种调整主要在于战胜国对德国政策的改变。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道威斯计划以向德国提供大量贷款的方式，变削弱德国的政策为复兴德国的方针；其二，不规定赔款的总数，使德国的赔款负担大大减轻，这两

方面都有利于德国的经济发展。到 1929 年德国重新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为它在政治上重新走入西方大国的行列和进一步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打下了基础。

作为道威斯计划的始作俑者，美国把该计划视为自己经济外交的胜利，但因此也使它在经济上与欧洲的联系日益密不可分；与此同时，美国又坚持不在欧洲承担政治义务。前者在 30 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时将看得十分清楚；而后者则对整个 30 年代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

鲁尔占领的失败和道威斯计划的实行，使法国受到了沉重打击。它不仅失去了在赔款问题上的领导权，也不能再任意制裁德国，法国希望以彻底削弱德国来保证法国安全的打算落了空；而凡尔赛体系中对德国领土的处理也没有使法国获得安全感。因此欧洲的安全问题是凡尔赛体系遗留的另一个问题。

第三是欧洲的安全问题。凡尔赛体系对德国领土的处理，没有完全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涉及法国和德国。对法国来说主要是莱茵兰问题，对德国来说也是莱茵兰问题。英、美则出于不同的目的，对欧洲的安全十分关心。

在巴黎和会上法国要求肢解德国，被英、美反对。结果是以规定协约国占领莱茵兰 15 年和莱茵河东岸 50 公里为非军事区解决问题。但法国认为这不足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便要求英美两国用条约的形式对法德的边界现状提供担保，并在会议期间得到了英美互为条件的保证。但是由于美国参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批准美国对法国作出的保证，因此英国的保证也落了空。法国受到这样的打击后，虽然努力构建了自己的同盟体系（它与比利时、波兰结成同盟；加强了与小协约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联系），并用各种方法寻求集体安全，但没有实现。鲁尔冒险的失败和 1924 年道威斯计划的实行，进一步增加了法国的孤立和不安全感；而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1925 年 1 月协约国要从莱茵兰的第一占领区撤军，这就使法国的安全问题显得更为急迫。法国要求对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法德边界给以再保证，否则就以德国没有履行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为理由而拒绝按 时撤兵。

德国认为，凡尔赛条约是战胜国强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枷锁，其中对德国领土的规定十分屈辱。德国的领土莱茵兰被协约国占领 15 年，等于敞开着德国的后门，使协约国随时可以制裁德国，鲁尔占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德国也感到很 不安全。德国的东部边界被波兰走廊一分为二，更令德国不能容忍。因此德国是一定要收复被占领土莱茵兰并调整其东部边界

的。^①但是在 20 年代，德国的军备受到极大限制，经济力量也未恢复，不能马上达到把协约国赶出莱茵兰和调整其东部边界的目的。因此德国认为只有先改善与法国的关系，适当满足法国的安全要求，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但对其东部的领土则不能作出这种保证。道威斯计划实施后，国际形势对德 国有利，于是德国要求召开会议解决莱茵兰问题。

英国在战后对欧洲实行均势政策，既不愿法国过于强大，也不愿德国起而复仇，担心破坏莱茵兰现状而使法德再次冲突。因此英国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支持法德和解，在英国的干预下签订安全保证条约，以解除法国的担忧并使法国能从莱茵兰按时撤兵，并把德国拉入西方集团。美国当然希望欧洲的稳定以利于自己的投资，因此支持英国的立场。

于是在英国的授意下，由德国首先出面，建议在莱茵兰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开会解决安全问题，这就是洛迦诺会议。

洛迦诺会议共有 7 个条约、1 份最后议定书和关于德国加入国联的集体照会，这些文件统称《洛迦诺公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德、比、法、英、意相互保证条约》（即《莱茵保安公约》）。^②这些条约规定阿尔萨斯—洛林永归法国，并保证维持莱茵兰的现状，德国不能对法国进行攻击和侵犯，因此暂时解决了法国最迫切要求的安全问题。德国则重新获得了大国地位，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法德关系得到了改善。

由此看来，《洛迦诺公约》是对凡尔赛体系作出的又一次较大的调整，它使欧洲的国际关系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并为道威斯计划的继续实行和 20 年代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它的签署才真正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给了欧洲一段和平与充满希望的时期。正由于此，“洛迦诺精神”一词一时成为和解与安全的代名词，A·张伯伦甚至把它说成是“战争与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线”；而对此作出贡献的 A·张伯伦不但被英王特别赐予嘉德勋章，还与道威斯一起获得了 1925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至于斯特莱斯曼和白里安的作用也未受到忽视，1926 年他们俩也共摘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

但是《洛迦诺公约》也留下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其一，《洛迦诺公约》对法德边界所规定的保证是双向的，即德国不能无端入侵法国，法国也不能在没有英、意等国确定法国被侵略的情况下制裁德国，也就是说，即使德国违约，如果没有英国和意大利的确认，法国也不能单独实行制裁。占领鲁尔之事再不能重演。这实际上也是对凡尔赛体系的修改（凡尔赛

条约规定只要协约国认为德国违约就可以对德国实现制裁，法、比对鲁尔的占领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一旦协约国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在1930年从莱茵兰全部撤军，法国的安全早晚会成为问题。法国对此十分清楚，这也是1928年法国极力提倡《非战公约》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我们想到，当1936年希特勒公然撕毁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而进入莱茵兰时，法国却没有象鲁尔占领时那样出兵，而是遵守《洛迦诺公约》与英国协商。英国则认为这不过是德国人进入自己的后院而已，并没有侵略法国，于是希特勒获得了成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也就离我们不太遥远了。

其二，在该公约中德国坚决不对其东部边界作出保证，只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仲裁条约，其中没有对它们之间的边界规定任何保证的办法。这实际上打击了法国的同盟体系。法国只好退而求其次，自己与波、捷订立相互保证条约。洛迦诺公约的这种处理方法，为德国日后借口修改其东部边界而向东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德国最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从波兰下手。

第四是民族矛盾问题。这也是凡尔赛体系留下的严重问题。战胜国一再标榜以民族自决原则处理领土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根据掠夺战败国和它们自己的需要(包括满足战时签订的密约)来实行这一原则的。因此，尽管有一部分欧洲国家的领土基本上是按照民族的基础来划分的，但同时也在许多国家造成了新的民族问题。如捷克斯洛伐克(战胜国把原属奥匈帝国的包括300万讲德语的苏台德人的波西米亚王国，以及西里西亚的生活着波兰人的切欣地区划给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却产生了诸多新的民族矛盾，造成了中欧的巴尔干化，成为以后大国为打破凡尔赛体系而挑起新的国际争端的温床。实际上和约的主要缔造者劳合-乔治在当时就很清楚这一点。他在《枫丹白露备忘录》中说：“德国人民已经无疑地证明了他们是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力量的种族之一，但它们竟然被许多小国所包围，而这些小国中，有许多国家的人民过去从来没有为自己组织过一个稳固的政府，他们每个国家却都拥有人数众多的德国人，这些人吵闹着要和自己的祖国合并。我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能成为将来产生战争的理由了。”实际上，纳粹德国正是利用了民族问题(苏台德问题最为明显)，领土问题，不断挑起事端，一步步走向了大战。

第五是对苏俄的态度，对一战后的国际关系影响很大。苏俄问题是影响凡尔赛体系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威尔逊的传记作者、参加巴黎和会的新闻秘书贝

克尔写道：“俄国问题对巴黎会议的影响是深刻的，没有莫斯科就不能理解巴黎。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虽然在巴黎不曾有代表，然而经常都是强有力的因素。…俄国在巴黎起了比普鲁士更为重要的作用。”^⑧外交史家贝利认为，在巴黎和会上实际存在“五巨头”，除了劳合-乔治，克雷孟梭，威尔逊和奥兰多之外，列宁是占据了无形一席的无形成员，他比奥兰多更重要。劳合-乔治也在《枫丹白露备忘录》中写到俄国革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革命的影响，所以要求对德国提出和约，并且不能太严厉。

战胜国先是以消灭苏俄为目的，并组织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但是没有成功；接着又以孤立苏俄为目标，所以说凡尔赛体系是反苏反共的工具。这种防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大影响的根本宗旨，在以后20年内没有改变。但是实行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苏、德的接近，1922年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了苏德关系史上的“拉巴洛时代”。^⑩当30年代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日益猖獗之时，英法仍然敌视苏联，这不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苏德再次接近的原因之一，其结果是对二战的进程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六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参加国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美国对欧洲实行了力图在经济上获利，但在政治军事上不承担义务的所谓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于是国际联盟变成了英法操纵的为推行自己外交政策、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工具。但是必须指出，在维护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方面美国和国联并没有基本的矛盾。当30年代国联对法西斯的侵略采取绥靖政策时，美国的“中立法”不过是绥靖政策的变种，它们都在实际上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

第七是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关系问题。凡尔赛体系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极不公正，促使中国人民彻底觉醒。2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革命化，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因素。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冲击着列强的在华利益，使它们不得不对中国作出一定的让步，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1926年英国外交大臣A·张伯伦在其《圣诞节备忘录》中声明英国愿意就修改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进行会谈。^⑪这种政策体现在1927年英国把在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

但是日本在一战后在中国和亚太地区势力的恶性膨胀使英美极为不安，他们必然要设法遏制日本，这对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华盛顿体系及其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在亚太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大国也存在着相互妥协的前提。具体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亚太地区的争霸形势与战前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战前主要是英、法、俄、德、日、美相互角逐，争斗的中心是宰割衰弱的中国。战后，德国败北，沙俄消亡，法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和处理欧洲事务，于是在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便形成了英、美、日三国继续争夺中国和太平洋海上霸权的新局面。这种新的争霸格局有三条主线：

第一，日本在该地区实力的明显增强以及它独占中国势头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英、美两国的极度不安。因此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但都力图遏制日本的扩张野心。

第二，为争夺亚太地区的霸权，英、美、日三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使远东形势格外紧张。

第三，中华民族的觉醒以及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中国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列强极为惊恐。如何保护列强的在华既得利益，是它们必须处理的另一个问题，而且除非它们相互妥协，这个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但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百孔千疮，尚待复苏；各国人民的反战情绪空前高涨；东方兴起的巨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有力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再加上1921—22年发生的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各国统治者十分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巩固统治秩序。因此他们之间并不想以兵戎相见，而是希望召开新的国际会议，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彼此的矛盾。

这些前提就是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基础，而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美国则在这次会议上扮演了主要角色。

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来看，它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和发展，它在承认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占有相对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条约，修改和补充了凡尔赛条约中的一些条款，最重要的是暂时解决了巴黎和会上没有解决的关于列强对中国的问题，从而建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新的国际关系结构。就组成该体系的几个条约来说，它们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对战后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

首先，《四国条约》是美国外交的胜利，因为它成功地埋葬了英日同盟，遏制了日本的扩张野心，并且使美国只是承担在出现问题时的外交协商义务，而没有军事义务。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无论如何该条约是美国在战后与其他国家签订的

一个政治条约，它把自己的命运与远东的事务紧紧地联系起来，美国所标榜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远东并不适用。

其次，《五国海军条约》所规定的主力舰比率不仅对美国有利，也达到了在一定时期内遏制日本海军力量发展的目的。但是该条约关于海军基地的规定往往不被人注意。实际上，该条约规定美国不得在菲律宾修建海军基地，英国不得在香港和太平洋东经110°以东修建海军基地和新的要塞，日本则只承诺不在台湾设防。这是英美为了使日本同意战舰吨位的限制而对日本作出的让步。但是这个让步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尽管日本在主力舰方面劣于英美，但英美丧失了靠近日本水域拥有有效作战基地的可能性，这便使日本海军在新加坡以北的水域实际占有绝对优势。一旦发生战争，香港和菲律宾必将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这是日本在战略上的胜利。以后的事实证明了一点。

另外，对英国来说，它在靠近中国的地方没有大的海军基地（威海卫和香港太小，大的作战舰不能利用），而新加坡海军基地又迟迟未能建成，这使英国在远东的兵力极其薄弱。但是英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又不能指望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的军事援助保证是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6天才给与英国的），所以当日本对英国的在华利益发动进攻时，以出卖中国利益为特征的对日妥协就成了英国的一种政策选择，例如英日于1938年签订的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以及1939年英日签订的解决天津租界危机的有田—克莱琪协定等。^⑫可以说，华盛顿体系是英国从远东撤退的序幕。

第三，日本的扩张野心遭到了美英的遏制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不得不暂时收敛。于是日本在20年代主要实行对英美协调，对中国大搞经济侵略的所谓“协调外交”。^⑬但是日本独霸中国和东亚的既定国策不会改变，它必定会不断寻找机会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并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实行的政策就是明证。因此，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武装对抗早晚会发生，而当这种对抗发生时，美国也必定要干预。这就是下一个问题。

第四，美国是华盛顿体系的主要规划者和潜在保证者，《九国公约》是美国外交的最大成果，因为它长期追求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终于得到了实现。美国当然要力保以“门户开放”原则为代表的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新均势，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为此，当日本利用经济大危机而发动“九一八事变”时，美国提出了“不承认主义”。日本的坚决扩张和美国的

(下转第18页)

始。到东汉后，北方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逐渐内迁，在关中、并州、幽州一带与汉人杂居，以后又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到三国两晋时期，这些民族的社会上层，逐渐濡染中原学风，出现了一批尊儒习经，优游士林，精通汉文化的人物。如南匈奴左部帅刘渊及其儿子刘和、刘聪，族子刘曜等都博通经典，精研史籍，一派名士风度，名声远在一般汉族文人之上。又如鲜卑，东汉末迁至辽东后与汉族杂居，由此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上层也出现了一批汉文化素质很高的人物。如慕容廆年少时与幽州名士张华交游，并著《家令》数千言；其子慕容皝亦“尚经学，善天文”，西晋末年曾率慕容氏贵族子弟从平原经师刘瓛学习儒家经典。西晋末年，中原战乱，大批土人流入鲜卑部族，并被委以重职，由此而加速了汉文化的传播。毫无疑问，这类移民虽然大多是战乱的产物，但是对于迁入民族地区文化水准的提高，却会产生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

正如移民是双向的，文化的影响和传播也总是双向的。唐后期河北地区深受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移民的影响而出现“胡化”，就是汉族同样也会接受异族文

化的明证。但由于汉族在人口数量和文化上的总体优势，特别是少数民族一旦脱离牧业进入中原，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汉族文化无疑更适合他们新的需要，这就使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进入中原的军事征服者，毫不例外最后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移民除了导致学术与制度文化的传播外，还由于向其他民族传入农耕技术使不少民族由牧业、采集、狩猎转化为农业或半农半牧。到了近代，中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即使是原来的牧业民族也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比较单纯的牧业民族，也已经离不开粮食、茶叶等农产品，更不用说来自农业区的其他产品。当然这些民族的农业生产并不都是由汉族传入的，但汉族移民却使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水平取得很大的进步，汉族移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从事农业生产起了推动和示范的作用。在近代工业还没有兴起时，农业无疑是最先进、最可靠的产业，对一个民族人口的增长和经济文化的进步有着重大意义。农业生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物质基础，也是汉族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的来源，移民传播和推动农业发展是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上接第9页)

拒不承认日本的侵略事实，使美日矛盾终归不可调和，美日之间的冲突也早晚会发生。但是由于海军基地的限制，美国在远东的兵力极少，所以美国虽然可以在道义上对日本的扩张采取不承认态度，但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却对日本妥协退让，希望用谈判遏制日本，实际容忍并鼓励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最终使战火烧到了自己头上。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伍德罗·威尔逊：《伍德罗·威尔逊公务文件》，第4卷，纽约1970年版，第229页。

②“十四点”及其注释，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修订第2版，第3—12页。

③参见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233页。

④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30—531页，第532页。

⑤《枫丹白露备忘录》的全文，见劳合—乔治：《和约真相》，第1卷，伦敦1938年版，第404—416页。

⑥齐世荣，前引书，第40页。关于凯恩斯对德国支付能力的估计，还可参见《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

⑦A·亚当斯维特：《失去的和平》，纽约1981年版，第72—73页。

⑧《国际条约集（1924—193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05—218页。

⑨R. S. 贝克尔：《威尔逊与世界和解》，第2卷，纽约1922年版，第64页。

⑩关于热那亚会议和拉巴洛条约，参见鲁宾斯坦：《1921—1922年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

⑪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9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117页。

⑫关于英日签订的有关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和有田—克莱琪协定，参见拙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⑬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9—502页。